



新世纪万有文库

夏济安选集

夏
济
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33410

新世纪万有文库

夏济安选集

夏济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济安选集/夏济安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929-5

I. 夏… II. 夏…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35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72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 价	9.5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的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说明

1981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先生编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书中收录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这是大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首次知道夏济安的大名,知道夏济安在鲁迅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但是,迄今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夏济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更为广大的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却仍不为大陆读者所知,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夏济安(1916—1965),笔名夏楚、马津等,江苏苏州人。曾先后就读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1940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43年赴内地,曾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授英文。1944—1948年执教北京大学外语系。1949年春从上海去香港,翌年秋赴台湾,在台湾大学外语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55年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英文系进修一学期。翌年在台北创办《文学杂志》,主编这份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刊物长达四年之久。1959年春再度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不幸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

夏济安的教学和文字生涯表明,他基本上属于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学院派”,但他是力图沟通“学院”与“文坛”的先行者。他去世之后,台湾文坛有人这样评价他:

他可以说是第一位从学院的围墙里严肃而赞美地向一般创作文学伸出“援手”的人物:他的理论和批评一度成为自觉的小说作家底指针和鞭策;他创办的《文学杂志》把“朝

(学院)野(文坛)”的距离拉到粘合的程度;他的影响力透过台大外文系的弟子,犹显明地扩大着。论中西文学的修养,夏济安是海运开通以来少数翘楚之一;论见解,夏济安所理想的中国新文学永远摆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一端;论文采,五四以来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没有多少人可以赶上他。

虽不无溢美之词,大致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作为五十至六十年代海外文学批评界的代表人物,夏济安的文学批评深得西方“新批评”理论的精髓,他强调文本细读,注重精微的作品内析,主张“同情的批评”。他评鲁迅小说和台湾作家彭歌的长篇《落月》,他论中西现代散文和诗,他谈欧美文学和文化,他说中国旧文化和新文学,处处可以清楚的看出态度的诚恳,分析的深入、观点的纯正和超前的睿智。他在海内外“学院派”中率先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显示了他文学史家的远大目光。

夏济安留给后人的中英文著译甚丰。英文的代表作是《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1968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的就是这本《夏济安选集》,这本精选集于1971年3月由台北志文出版社初版,列为“新潮丛书”第六种,此时距夏济安去世已经六年矣。书分“文学评论”和“小说与诗”两大部分,后者展示了夏济安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书前有陈世驥序,书后有夏志清跋。“文学评论”部分中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原系《黑暗的闸门》中之一章,由香港著名作家、翻译家、夏济安生前友好林以亮(宋淇)译出;《评〈艾思本遗稿〉》、《论夏德》、《论狄达勒斯》、《维农陀》、“小说与诗”部分中的《传宗接代》也都为英文,分别由他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庄信正、柯丽美、江森等译出,而今这些译者也大都成为文坛名家了。

为了填补大陆出版夏济安著作的空白,继《夏济安日记》之后,“新世纪万有文库”再次推出《夏济安选集》大陆增订版。增订版抽出台湾版“小说与诗”部分中的《苏麻子的药膏》和《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两篇

小说,新增“集外”和“附录”两大部分。“集外”部分收入夏济安四十年代初在上海光华大学《文哲》和《西洋文学》上发表的书评、史学和文化评论五篇,从中可以体会夏济安早年的文学和文化观,看到夏济安是如何在文学批评上起步的;还收入夏济安后期为《文学杂志》写的《致读者》,对进一步了解夏济安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对研究台湾文学都颇具参考价值。“附录”部分收入夏志清根据夏济安书信辑录整理的夏济安对中国明代至民国时期俗文学的许多精辟而有趣的看法,对把握夏济安后期的文学史观至关重要。

陈子善

1999年1月16日于上海

序

夏济安先生的遗著，收成这本集子，作《新潮丛书》之一，到出版时，当正是济安去世的六周年。提笔作序，难免又追怀伤逝。但是对于无论济安的友好，或是他的新旧读者来说，其纪念性不只是属于适逢际会，或只又六年一度的悼念。济安遗著，列入这新“新潮”，是有长远、广大、深厚的意义的，而且我们更企望它不断有长远、广大、深厚的影响。

“新潮”在这里的意义，照《丛书弁言》来理解，已经和上一代所素称者不同，不是如以前，多只意味着“西潮”的东侵，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是彼此撞击互相建设的文化，我们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看这里收集起来的济安遗著，正是在近二十年来中西文化的新撞击中，艰苦产生极富建设性的成果。而且虽然是小小的一册，其著作本身和所发生过的影响，正是意味着，如这里“新潮”所抱负的，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如此，这部书，正是立在这里所谓“新潮”的主流中。

这些文章看来都属于文学批评创作的，但深远处暗示着作者对现时中国文明的关心。他绝无一句空洞的口号，篇篇都是谈具体的，甚至技术的问题，关系文艺、文字，以至文学修养和教育。但是他对文学的批判、建议、企望以至贡献，反映着他对这一时代中国文明的批判、建议、企望，和贡献。这种现象在中外古近历史的某阶段上是颇有前例的。文艺的创作批评，总必是具体的微言，但出于斯人斯地，以不离本行的话说出，却有了广泛的大义。而这种现象常是发生在历史转换的苦难阶段，产生于特有才具，身心经历这苦难，对文艺有丰富的经

验，深入的体会，而又有相当超脱的智慧的人。而此人此文又常是在几种文化的新撞击下屹立起来的。

最明显的近代西洋例证，如艾略特 (T. S. Eliot) 的创作和批评的巨大成绩，出现于第一次大战后艰苦的年月。而他是走出乡土气最重的美国西部，带着美国传统新耶教气味，广泛接受欧洲古典和近代文化，而终至寄身异域，在文明撞击下返入旧教的人。在我们中国古代文艺丰富，而专致力于文学研究批评的不多。但也有一个显例，那就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彦和了。看彦和此人此文，岂不也是出现在文明一度支离破碎，人叹世衰道丧六朝到唐复兴的转捩点。刘勰的伟著，也只是最具体的深入文学本身，校练宗旨，详析技巧，决无似前代清谈的浮掠以充潇洒，更决无空洞的口号或说教。但全部不独反映，而且可说加强、开辟、并重建了中国人文的文明境界，且赋与新的意义。我尝窃以为直等到《文心雕龙》，过去的“道”字，那个传统文明的标号，一切文史哲的口头语，已渐常熟极不察，而非玄则滥，到此才又有一度新的充实和诣旨。从“文之为德大矣”到“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提高了文，同时也充实了“道”。而且“自然”也不再流于空洞玄虚，而有了具体自然界的意象，成了“日月叠璧，山川绮焕”，龙瑞豹姿，林籁泉韵。这是一位专心瓣香文艺的人，在某一定的时代，由文艺的具体性，深入观察，更有远大眼光和智力来发挥，而对其当代的文明，在政论和横议都显虚脱无力的时候，奉给文明的无比贡献。可是我们不会忘记，彦和之遭遇和亲身感受的，也是一度中外文化的大撞击，那就是尽人皆知，传记明载的他那切身的沙门经验。那就是，再套一句《弁言》的话，从“印度潮”以梵理多年拍打着远东古中国陆地，到梁武帝几度不惜舍身的时代。

当时的“佛潮”和近代初期的“西潮”自然是内容和进入方式都大不相同，而若只就政教功利方面说，也都大可任意褒贬，不过将今比昔，至少有一点是大可比拟的。即“佛潮”到彦和时代已不是初来的“狂浪拍打”或被盲目的崇拜，或被顽强的扞斥，而其真谛已渐熟悉，被

消化,被吸收,渐溶于本土哲理,化入智识界的气氛。再加南朝虽然一时文艺创作不景气,可是对文艺专门技巧的自觉性,承着曹丕、陆机的先导,在眼看自身文明劫运时,更觉这“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文艺,要深长思之,有无比的重要。但是有自觉,只口说重要还是无用的,到此便须幸而出生一个特有才具、有热心、有远大眼光能高瞻远瞩的人。他能在这文化大撞击后的新气氛中,回顾自己整个文学以及文明的传统,而极有消化力的深知如何用来借鉴,作自觉的批判和说明,这当时就是刘彦和了。他本人在幼年及在晚年之切近佛门,是史传大书特书的。但是《文心雕龙》一书,体大思精,辨析精微,却很少谈梵引释的。这也许是他消化的太好了,只把释门的思路辨才,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索,而不著迹象。但恐怕更是因为这是中国有史第一部整个传统文学的精研深索大融汇,所以力求精纯不驳。

“佛潮”究竟和今日“西潮”不同,只限梵经佛典,一旦大量介入,最富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是显得过分玄虚,便似戒律教条。而精湛的文学研究是最忌玄虚和教条的。所以我们再分析说,在我们的第五六世纪时,“佛潮”东来以后,经过长期激荡拍打,其精谛与实验价值,已渐熟悉而融入知识界的气氛,这是和我们二十世纪后半,五十年代以来的所谓“西潮”新情况,多是相通的;其对当时文学研究的新启发,以及暗示着由此而来的文化“互相建设”,由文学的新自觉,而“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这也是正可相比拟的。但是现时“西潮”的情况,和那古远的“佛潮”,即使在此意味上说,又大有不同。就是现时所谓西潮,由其结果引起的新“新潮”而论,只就文学研究而言,决不限于宗教,甚至可说绝少关于狭义的宗教。而在其他方面,比起《文心雕龙》时代,可就太多。能选择借鉴的太多,甚至能直接引入对照以及消融的也太多了。所以《文心雕龙》在当时是仅成的硕果,甚至在形式表面上很少露出外来“佛潮”影响的形迹;而现时我们则可期望着繁多的成就,并且以我们所期待的新文学研究,“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时,我们的成就,不可能也不必要掩盖这新潮与外来影响撞击交溶

的迹象。相反的，我们现在既自信是已经“相得”，乃无妨使之“益彰”。这种成就的前景，自从五十年代以来，我认为，并且有事实明证，济安这虽是薄薄一本遗著内的文章，曾是一个有力的发轫。

我们自然不是把济安其人其文，和所举的中外古今两个平行例证，来作整个的比类的。时间、环境，以及各种文化撞击时所表现的特质，和可能的结果，都是不同的。何况他在更飘摇动荡的生活中，又是英年早逝！但是我们相信这新“新潮”的定义与期望，和历史上平行例证对比而见相通，是不错的；而我们说他是先站在这个新潮的主流中，说他是这个新阶段幸而产生的一个人，这两句话，我们也相信是在“自由中国”一片土上，近二十年来，严肃作文艺新创作新研究的人，所可明眼公认的。再者，说到新阶段新潮内中西文化撞击对中国文学进一步的建设性，而提出济安的地位贡献，我们决不是蔑视上一代。的确，中西贯通的前辈，和他们筚路蓝缕以至今犹持续的成绩，还都是昭昭可指的。但需要说的是济安奋起为中国新文学努力的时候，一方面国家的危难环境是空前的，一面五十年代以来国际文化关系的转变大开放，当然就“自由中国”说，也是空前的。因此斯人之出，既可以说极难能，又可以说好际遇，而终是有他特殊的可贵。

这部遗著内的文章，大概是已经多人读过的，自然无须再详为介绍。但合起来再看，关于其中几篇，我觉得有点个人的意思可说，那就是我所了解的济安之著作态度。几篇文章内常常出现的，他自己一句话“同情的批评”正是他的真正态度而身体力行的。这句话看来太平常，而且常常说，人人说，不但文学家说，中外政客，党派竞选，更是最常说。但真正能作到的实在太少，因此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也就失掉了。可是只有真能做到的人才配说，才能真了解这话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济安的几篇文章内，看他真的身体力行，使我们恢复对这句话真正意义的了解。我们看他评彭歌《落月》的文章，看他论现代散文和诗，看他论西洋文学和文化，再看他评中国旧文化与新文学，处处可以体验“同情的批评”这句话的字字原意、本意、真意，即实际应有的意

义，和做到以后真可宝贵的价值，并且更重要的是看到这句话的积极性。旁人一般说惯，大概只作消极的理解：“同情”变成多只是原谅或可怜什么不幸；“批评”只是在挑错误。于是“同情的批评”实用起来成为“原谅错误”的声明或请求。为之者自示宽大，受之者谢您高抬贵手。用于政治，归为妥协；用于文艺，落得旁敲侧击之后做个好好先生。但济安在这些文章里的“同情的批评”，一反这些俗意。他的“同情”真是同鸣共感，而深入的参与到主题对象以内；他的批评真是由排比辨析（批字原意之一）直做到持平的评，更又平稳的、积极的向前推进。从他这最平常的一句话；都运用到本意真诠，就可见其为文之不苟；从他的言行之有力，更见其为人之挚切，而富于爱的智慧。

试看他评彭歌先生的《落月》一文，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像比作者自己还着急、热切。所以他的卓越见解，渊博知识，一点也不显着是自己炫耀。这样无私无我，才是真正的同情。他的指摘、辨析，无处不是精细的实例，平心对比衡量而求具体改益或发明，这才是真正的批评。他论现代散文，网罗他所有的切身经验和观察，批评处句句切中时弊，但又指出集合古典今言，俗语土话和舶来译语之大总汇，如何用到好处，力须弃浮去滥，可以使我们的散文更丰富多能。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尽管说的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

他论新诗的文学是最谦虚的，写时他大概还只有过一年实地留美的经验，但介绍进的西洋理论，正都是现代美国在世界文艺曾起领导作用的，所谓“新批评”的精髓。他自己绝少作新诗，但由于他特有的积极“同情”能力，他深入的体会到作新诗的甘苦，他又决不甘于重复浮滥玄虚的话，如“灵魂、心、敏感”来说诗，而特别提出诗人“还需要一副供制衡、选择、判别、组织之用的头脑”。他鼓励，同时加警戒。他介绍西洋理论精华，可谓深透，但不但决不自炫，也决不只为所介绍者令

人耀眼。在介绍西洋进步的理论之后，他极聪明的加一篇介绍西洋的“两首坏诗”，曾是两首享过盛名的诗，至今受现代批评的严厉指责，以证盛名之下未必无虚。标语、口号、肤浅芜滥的感情表现，即使幸而混过一时，终被暴露。这样“西诗之弊”，可同于“中诗之弊”，犹如另处他说我们的“今文之弊”，不少于“古文之弊”。这样能持平而又加力向前推进的文艺评论基调，我认为是五十年代以来“新潮”内，济安在中国所能代表的特色。前一代的人未必都无此见解，但在“五四”后的一二阶段上，中西贯通的前辈，介绍西洋文艺，或讨论今文，不会立此重点的。

这里可以加一段插话。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冬，那时我和济安还没有见过面，他正在台北预备出《文学杂志》。胡适之先生正在加州柏克莱本校讲学，济安写信给适之先生，托转约我为他写文章。适之先生的热心援手是可以想像的，在旅馆拿出信来给我看，并且叮嘱。看济安信上期望很大，想促起台湾的新文艺创作，并且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当时我随便问：“写点哪一类的文章好呢？”适之先生毫不犹豫的回答：“他们还是应该多翻译些西洋名著看看，我已经写信跟他说了，实秋先生也可以帮忙……”而且适之师，如其人，果然说到做到。记得接到《文学杂志》的初几期，看其中果然是有胡先生的翻译。我则是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算第一次满足了济安的要求，而文章则是到台北后小住，也许是沾染了那已渐开始的新“新潮”气息罢，却写的是论杜诗，略用西洋“新批评”的加重内析方法，但推及西洋近代某种对悲剧的精微理想，在其试验的戏剧形式中并未成功，而在中国诗篇杰作，像《八阵图》那样精绝短章，倒确实体现了那种悲剧的精神。现在回想《文学杂志》那最初几年的历史，由济安的中坚活动，确然是集合了老、长、幼几辈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大家都有点贡献，也可以看出“重点”的渐渐不同，或就是引向新“新潮”的开始。

济安的思想，可说寸步不离文学园地，甚至多于技巧处深入精微，其实《文心雕龙》岂不亦然？但如我们前头所说，由平行例证可见，在

一个历史的新关键上，严肃热诚的文学思想家，自然逻辑性的，由深入文学的考察，会具体提供由文学、文字，到文明和文化的考量。他论新诗，不只热望新诗能狭义的把篇章技巧做到完美，而又提到文化的顾虑。但他决不大声疾呼任何空洞口号，甚至也不能满足于像别人所说“我们写诗……是将来整个一个传统的奠基石”这一类话，而更进一步有警戒性的说到白话文和文化的问题：

我们且慢为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觉得欢喜。假如白话文只有实用价值，假如白话文只为便于普及教育之用，白话文的成就非但是很有限的，而且将有日趨粗陋的可能……我们现在写诗，是考验白话文能不能“担起重大的责任”，白话文能不能成为“美”的文字。假如不能，白话文将证明是一种劣等文字；白话文既是大家写作工具，那么中国文化的前途也就大可忧虑了。

这段话我加了几处圈引出，认为是所有关心中国文字、文化、教育的人和负责的人所应深思，看重新诗的地位、功用和指标；而同时更要自己作新诗的人三思又三思，了解如何能“担起重大的责任”。

最后，既一再说到济安对文字、文学，和文化的严重关联，和他看到的路数，不得不略谈一谈他另一篇文章：《旧文化与新小说》。这是一篇题目最重，最容易引起困难的文章。我们要以济安自己那种真的“同情的批评”的精神去了解他这篇“同情的批评”。他的主旨是鼓励我们的新文学作者，也努力汲取自己古文化的泉源。推到古远终极，不能不提出孔孟之道。其在中国的传统领导权威的地位，相当于西方宗教，虽然在本质，尤其是组织形式方面，大大的不同。他所谓“逊色”恐怕该说是这许多根本大不同的结果。既全不同，就无所谓真的“优色”或“逊色”了。但既都同是有“教”的权威地位，无论中西，都自然而然演出传统“教条”。久之，教条在人心目中就掩盖了原来的哲理神

髓。使原来活生生的语言 and 情操，都似僵化起来，令人望之生畏或疏远，不能再使新的创造想像力与之易起共鸣。固然正面的提倡“教义”或“道旨”，加以新解卓见的诸公，不乏可佩的努力。但是更可以了解，如何使文学新的创作想像力，冲开教条藩篱，而再与这自己古文化泉源同鸣共感的结合起来，不是观念的复古，而是想像创作的培新，在今日文学与文明的艰苦大挣扎的关键上，是非常值得提出鼓励的。其中困难很多，更非攘臂大呼所能济事。

济安这篇文章极力避免口号，绝非说教口吻。只是把孔孟的话，尽量回复到活生生的语言来理解，而套入现代文学技巧看法，引作家走入试试，不要怕这已是圣人之“道”而生畏，或听某些人说惯而生厌，却要凭自己以新肝胆相见去了解，生“同情”共鸣，去求新的开发和弘阔，融入文学各种形式的想像创造。文学史上提出圣人之道以领导创作的，说“载道”、“明道”、“贯道”，或“卫道”，怕是都已太听熟而厌习了。而且既使我们严肃的考虑这些提议，用在文学创作理论上，至少以我们今人之见看来，觉得都大有偏差：“载道”岂不意味着“道”只是文学的负担，束缚想像？“明道”成了明使文学说教，“贯道”更是暗示着勉强，极拘束的局限性，而“卫道”更是先认败仗，色厉内荏者的口吻。但是既说到此处，我们如果还是愿回顾而直视这个问题，又不能不为简单扼要，还用这个“道”字作标号，为了回啜远祖文化泉源，而弘阔自己新想像创造境界，倒似可翻新回引孔子自己一句关于“道”的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我们之为现代人，以我们活生生的想像创造力，回念当时孔孟老庄之活生生的想像创造和他们的活语言。如果这些语言是“道”，则不可畏，不须避，而在各形式的文学创造中，以我们现代人广阔的境界，默化潜移，也许可以说我们现代人还是能以文兼“弘道”吧——只要我们不忘了“弘道”上面两个字是“人能”作条件。人只是我们自己，凭想像创造，不是受别人的教令，更不是权威的胁迫。

为什么直到最近，耶教的《圣经》故事在西洋，如希腊的卡赞查基

思，还能创出小说巨著，而中国古典不能？这不是正统虔诚问题。卡氏的小说决不代表耶教正统，而在他能把基督造成活生生的现代意念形象，好像和现代人的善恶迷惘，爱欲困扰，和独往的精神之可贵，更错综复杂的打成一片，而成为一个崭新角度的想像创作。自然，耶教笼罩下的全欧西文化是非常多元的、繁复的，所以常可以有新的撞击，发生新的角度，激励新的创作。我们因此希望“新潮”所承认的新的文化“撞击”中，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更站起来，也产生无数的新角度，汲取多种泉源，包括古典文化，甚至“教”和“道”在内。果然，则济安这篇文章，也更是有发轫的力量了。

匆忙赶完此序，寒夜孤灯，不知济安地下颌笑否。手抚稿页，觉得他遗著的一部分这薄薄一册，却会使善读者感到重大的精神分量。他的透辟见解，隽永笔锋，又会令人读着时而惊喜。但他终是像有许多重要话，尚未说完，便突然离去了。如他的同姓，清初烈士夏完淳的一句诗：“千古文章未尽才”，思之怅然。但念及说他是这“新潮”的发轫力量实有重重明证，展望前景其所能启发的无尽人才，总是不禁又想起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快乐的啊。”

陈世骥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夜完稿